

《太平寰宇记》润州丹徒丁卯埭条辨误^{*}

徐光明

《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一》润州丹徒县下记载：“丁卯桥，在城南。晋褚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以丁卯日。后人构桥，因名。许浑别墅在其侧。”^①此条不记出处，本卷校勘记第23条言：“万本无此四十一字，《库》本同。”^②

然检核顾野王《舆地志》，立埭之人并非褚裒，《舆地志辑注》扬州毗陵郡丁卯港条记载：“晋元帝子车骑将军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③

《太平寰宇记》（以下简称《寰宇记》）所记虽无出处，然必有所本，其中丁卯埭此条当出自《舆地志》。如《舆地志》的记载紧紧围绕丁卯埭的设立展开（立埭之人、立埭缘由、获准日期、埭名来历），《寰宇记》的记载包含丁卯桥、丁卯埭、许浑别墅三项，以丁卯桥为记叙主体，夹叙丁卯埭来历，后补以许浑别墅。《舆地志》中是丁卯日准奏立埭，《寰宇记》中记桥之得名取自埭名，则丁卯桥建成当在立埭之时或此后不久。如《佩文韵府》引《京口志》记此事：“晋时尝以丁卯立埭，因以名桥。许浑别墅在焉，集以为名。”^④

对比二书，笔者以为立埭之人当从《舆地志》作司马裒，而非褚裒。《寰宇记》此处所记乃是出自后人的篡改，乐史不察，遂有此误，以下详论之。

一 司马裒立埭考

此处拟从历史事实方面推论《舆地志》记载的可靠性，由考证司马裒与褚裒二人在广陵、京口的事迹展开。

（一）司马裒事迹述论

《晋书·元帝纪》记建武元年（317）三月辛卯，司马睿即晋王位，改元建武，“丙辰……封王子宣城公裒为琅邪王”^⑤。《晋书·元四王·琅邪王裒传》记：“及帝（司马睿）为晋王……更封裒琅邪，嗣恭王后，改食会稽、宣城邑五万二千户，拜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

* 本文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史料批判视野下《太平寰宇记》研究”（25E139）阶段性成果。

①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89《江南东道一》，中华书局，2007年，第1760页。“以丁卯日”后，原书标点为逗号，细绎之下，当以句号为准，故改之。

②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89《江南东道一》，第1769页。按，万本指清万廷兰刻本，《库》本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顾野王著，顾恒一等辑注：《舆地志辑注》卷15《扬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44页。

④ 张玉书纂修，王云五索引主编：《索引本佩文韵府》卷13上《上平声·十三元韵》浑字之“许浑”条，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37页。又见同书卷48《上声·十八巧韵》卯字之“丁卯”条（第1956页）。

⑤ 《晋书》卷6《元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45页。按，“丙辰”当从《建康实录》所记“夏四月丙辰”，即四月四日，参见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5《中宗元皇帝》，中华书局，1986年，第127页。

军事、车骑将军，征还京师。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赠车骑大将军，加侍中。”^① 则司马袁出镇广陵在四月丙辰受封后。《资治通鉴》记建武元年六月祖逖进驻谯城，石虎围之，寻解去。己巳，司马睿传檄天下，遣琅邪王袁等九军受祖逖节制，寻召袁还建康。^② 自四月丙辰（四日）到六月己巳（十八日），司马袁坐镇广陵，为时两个半月左右。陈垣《二十史朔闰表》记建武元年六月壬子朔，知此月丁卯为十六日。^③ 十八日司马睿传檄令司马袁等受祖逖节制，准备北讨，那么召集军士、筹措军粮诸事必在此前。《晋书·元帝纪》建武元年，“是岁，扬州大旱”^④。《建康实录》记：“是岁，扬州大旱，晋陵内史张闾奏立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⑤ 大旱导致水道干涸，军粮运输由京口北上广陵，中途受阻，故而需立埭截取水流以通航船只，所以司马袁向其父申请立埭。广陵至建康距离不远，且军情紧急，开埭奏章递交到晋王府审阅批准并返回广陵，当在数日之内完成，所以丁卯必为六月丁卯日。^⑥ 考虑到天气和军情因素，此时立埭，合情合理。

尚有需要辨析之处，《舆地志》中的“丁卯制可”，殊为不伦。天子所用文书四类，蔡邕《独断》：“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⑦ 刘勰《文心雕龙·诏策》亦记：“汉初定仪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⑧ 可知策制诏戒实为皇帝专用文体，故《舆地志》所言“丁卯制可”有违常规，因为司马睿建武元年尚未登基，不能下达制书，次年称帝后才在名义上具有行使天子公文的合法性。笔者以为此处有两种解释，一则彼时北方神州陆沉，司马睿在江东临朝称制，事从权宜，如平东将军宋哲至建康后宣读愍帝诏：“卿指诣丞相（司马睿），具宣朕意，使摄万机。”^⑨ 二则顾野王所记并不严谨，存在谬误之处。

（二）褚裒事迹述论

褚裒，字季野，康献皇后父。康帝为琅邪王时，纳裒女为妃；康帝即位，褚妃立为皇后；穆帝即位，褚太后临朝。褚裒因联姻帝室，在当时地位高贵，尊崇莫比，颇受重用。

结合史书，褚裒有两次出镇京口、一次屯守广陵的经历。建元二年（344）九月，康帝崩，褚裒“改授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二郡诸军事、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镇京口”^⑩，《晋书》即于此条下引《寰宇记》^⑪，此为褚裒第一次出镇京口。据《晋书》之《穆帝纪》和《外戚·褚裒传》，永和五年（349）秋七月褚裒北伐，兵败代陂，八月退屯广陵，还镇京口，忧愤

① 《晋书》卷64《元四王·琅邪王袁传》，第1725—1726页。

② 参见《资治通鉴》卷90《晋纪十二》，元帝建武元年，中华书局，2011年标点本，第2895页。

③ 参见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53页。

④ 《晋书》卷6《元帝纪》，第149页。同书卷28《五行中》记：“建武元年六月，扬州旱。”（第840页）

⑤ 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5《中宗元皇帝》，第127页。

⑥ 按，四月亦有丁卯（十五日），相比之下，取六月丁卯更稳妥。

⑦ 《蔡中郎集》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63册，第139页。相关分析参见刘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50—155页。

⑧ 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264页。

⑨ 《晋书》卷6《元帝纪》，第145页。

⑩ 《资治通鉴》卷97《晋纪十九》，康帝建元二年，第3111页。同参《晋书》卷93《外戚·褚裒传》，第2416页。

⑪ 参见房玄龄等撰，吴士鉴、刘承幹注：《晋书》卷93《外戚·褚裒传》，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本，第1528页。

成疾，十二月己酉，哀卒，年四十七。要之，褚哀屯守广陵的时间很短^①，兵败之余，或无心政务，至于“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的可能性则很小。巧合的是，永和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②，当年干旱的天气作为历史背景，加之八月亦有丁卯（二十三日），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后人以为褚哀有立埭的动机和时间，在传抄《舆地志》过程中，遂判定褚哀立埭而增补之（详见下文），给我们的考辨带来一定的难度。根据文献记载，将司马哀与褚哀相关信息进行比较，作表如下：

司马哀、褚哀对比表

人物	年龄	身份	职官	驻地	时间段	背景	具体日期
司马哀	18 (300—317)	皇子	琅邪王、 车骑将军	广陵	建武元年四月丙辰 至六月己巳	是岁，扬州 大旱	六月丁卯 (十六日)
褚哀	47 (303—349)	后父	征讨大都督、 征北将军	京口 广陵	永和五年八月 至十二月己酉	七月不雨， 至于十月	八月丁卯 (二十三日)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二人取名相同，均为皇亲国戚，身居高位，有出镇广陵的经历。相比之下，褚哀作为褚后的父亲，活跃于成帝、康帝、穆帝三朝，达 20 余年，名声更大，寿命更长。司马哀则英年早逝，仅活跃在东晋草创初期，可谓昙花一现，名声较之褚哀更显逊色。比较建武元年（六月）和永和五年（八月），这两年都出现干旱天气，同时有军事活动需要运输军粮，皆有立埭的动机，而且所处的月份都有丁卯日，迷惑性大增，给后人分辨二人、二事造成许多困扰。

二 文献的成书时间、征引与篡改

以下讨论《舆地志》《寰宇记》的成书时间、后世征引情况，同时论及后人对《舆地志》的篡改问题。

（一）成书时间

《舆地志》为南朝陈人顾野王所撰，时间在陈文帝天嘉元年（560）以后。^③《寰宇记》成书于北宋太宗雍熙末至端拱初之间^④，亦有学者指出成书在真宗咸平三年到五年（1000—1002）。^⑤二者比较，《舆地志》早于《寰宇记》至少四百年的时间，当以《舆地志》的记载为准。

（二）后世征引

《舆地志》关于丁卯埭的记载，后人多有转引，《舆地志辑注》所引有嘉定《镇江志》卷 6、《舆地纪胜》卷 7、《寰宇通志》卷 16、至顺《镇江志》卷 2（按，卷 7 亦有）、《吴中水利》卷 20，时代涉及南宋、元、明，连绵不断，可见后人多有信从者。反观《寰宇记》此条，征引无

① 具体的日期因文献缺载，不可考。然广陵、京口隔江相望，加之退屯广陵在兵败之后，诸事萧索，褚哀当不久即渡江还镇京口。

② 《晋书》卷 28《五行中》，第 841 页。

③ 参见陆帅：《顾野王〈舆地志〉的著录、征引与内容——以唐宋文献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1 辑。

④ 参见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前言，第 2 页。

⑤ 参见张保见：《〈太平寰宇记〉成书再探——以乐史生平事迹为线索》，《中国地方志》2004 年第 9 期。

多，可信度令人怀疑。乐史而后，直到清道光年间许鸿磐《方輿考证》卷46，民国吴士鉴、刘承幹《晋书斟注》卷93方有征引，引用者可谓寥寥无几，这或许能反映出后人对《寰宇记》此条记载的审慎态度。

此外，《輿地志》立丁卯埭之人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还可以从抄本文化角度进行解读，即后人在传抄中存在篡改现象。如所周知，魏晋至隋唐是中国的传统写本（抄本）时代，书籍的产生、获得、流通尚需要通过抄和写此类活动得以展开^①，在此过程中，脱文、衍文、增文、擅改等诸多现象都有可能发生，极易造成文字的变异，脱离文本原来的真实面貌。这一现象同样适用于《輿地志》，如陆帅认为《輿地志》作为写本时代的书籍，在传抄过程中存在被人修改或自行添加注解等情况^②，所以我们不能否认《輿地志》存在被改动文本的可能性。

循此思路，比较《輿地志》与《寰宇记》中立埭之人的不同记录，对比如下：

《輿地志》：晋〔元帝子车骑将军〕袁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
《寰宇记》：晋〔 褚〕袁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

笔者推测，《輿地志》中有关晋时何人出镇广陵之前数字在传抄过程中有所脱落，仅余“晋××袁”二字可识，后人遂以褚袁补之。有晋一代名袁又出镇广陵者，唯司马袁与褚袁二人，而褚袁较司马袁更为知名，故致此误。后乐史修《寰宇记》，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有误的《輿地志》本子，未及仔细考辨，遂将之誊抄在《寰宇记》中。抑或是乐史本人将之增补为褚袁，因为《寰宇记》大量征引《輿地志》，如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6《地理》指出：“《太平御览》《寰宇记》引《輿地志》甚多。”^③陆帅统计《寰宇记》征引《輿地志》达两百余条^④，在这其中，我们不能排除乐史本人改动《輿地志》文本的嫌疑，他也一并增补了丁卯桥、许浑别墅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輿地志》关于立埭之人传抄中脱落的部分，除增补内容使其完备外，还要考虑字数问题，后人增补单个“褚”字，远高于增补“元帝子车骑将军”或“元帝子”多个字数的概率。然此非关键，最为紧切者乃是褚袁立埭具有极大的迷惑性，故而误导后世读者。

综上所述，《寰宇记》记立丁卯埭之人为褚袁，当依照《輿地志》和《輿地纪胜》等书记载，更正为司马袁。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黄河文化研究所）]

本文责编：周全 宿万涛

① 写为全取，抄为节抄，参见陈传万：《魏晋南北朝图书业与文学》，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0—101页。

② 参见陆帅：《顾野王〈輿地志〉的著录、征引与内容——以唐宋文献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1辑。

③ 《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4册，第4995页。

④ 参见陆帅：《顾野王〈輿地志〉的著录、征引与内容——以唐宋文献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1辑。